

Min Longhua u.a.: Hanyu Jianlüeyu cidian (Wörterbuch chinesischer Kürzungen), Guilin 1988.

Shen Mengying: Lüelun xince de tezheng (Anmerkungen zu Besonderheiten von Neologismen). In: Xinci, xinyu, xinyi (Neue Wörter, neue Wortgruppen, neue Bedeutungen), Nanjing 1985, S. 1-27.

Summary

Short form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formation of short forms in modern Chinese is a productive means of extending the vocabulary. Short forms are lexical units that result from the reduction of syllables of longer lexical units. Because of the typical syllable-morpheme-character correspondence in Chinese the syllables are not eliminated arbitrarily but the elimination is determined by morpheme-semantic factors above all. Short forms can be expressed graphically. Apart from words consisting of one morpheme but more than one syllable all long and short forms have a structure of constituent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constituents can be described as subordination, coordination, verb-object-relation or subject-predicate-relation. Criteria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short forms into classes A, B, C, D are the modification/non-modification of the syntactical/word-syntactical relations of the constituents in the process of shortening and the determination, which of the constituents are shortened and how far they are shortened. Especially nouns are effected by the formation of short forms, verbs are less and adjectives scarcely effected by this process.

汉语动调配价与句型划分

韩万衡

配价论由法国语言学家吕西安·泰尼耶尔于五十年代创立^①。泰氏生前，其理论未能得到语言学界的理解，因而倍受冷落。五十年代，德国语言学家发现泰氏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他们对配价论作了重要补充和修正，并根据德语的特点作了创造性的发展^②。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配价论的基本原则已为许多欧洲国家的语言学家所接受。他们用配价原则重新描写本族语言，尤其在句法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近些年来，配价论又进入了对比语言研究的领域，为对比语言学开创了新的前景^③。

配价论进入我国较晚。冯志伟的《特尼耶尔的从属关系语法》（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一期）可能是最早介绍配价论的文章。朱德熙、吴为章应是首先用配价论研究汉语结构的中国学者^④。

我国德语界了解配价论的人较汉语界多，1987年国家教委批准试行的《德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规定，句法教学应采用配价原则。这标志着配价论已得到我国德语学术界的认可。

配价论能否用于汉语结构描写，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德国一些汉语学家做过一些尝试^⑤。我们天津外语学院德语系的配价研究小组曾于1988年10月在汉德对比研究会第三次年会上（武汉）发表了一篇学术报告^⑥，介绍我们用配价论描写汉语结构的初步结果。我们与西德曼海姆德语研究所计划合作编写一部《德汉动调配价对比词典》。该词典将收录600个常用德语动词，详细描写其配价特点及句型结构，并配上相应的汉语动词及其配价和句型。我们正在进行的汉语动调配价描写是这一词典的基础研究。

汉语配价研究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有重大意义。配价论是以屈折语为研究对象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理论。此理论能否用于孤立语（如汉语）的描写，是配价论学者极为关心的问题。我们如能给予积极的回答，将对配价论的发展与完善作出突破性

的贡献。配价论又具有极强的实用性。泰尼耶尔的配价思想本身就是在外语教学的实践中产生的。德国学者研究这一理论的初衷及其后来的成果，莫不紧密为对外德语教学服务。今天，我们从事汉语配价研究，除了理论上的目的和汉德语言对比的需要之外，也是为了探索对外汉语教学的新径。目前，对外汉语教学采用的语法体系很难为欧洲学生（包括以欧洲语言为母语者）所接受。为了更好的进行外汉教学，迫切需要研究一种新的汉语描写方法，我们希望配价论能为此提供基础。

作为德语教师，我们虽然略知一些配价理论，从事汉语研究毕竟力不从心。我们衷心希望与中外汉语工作者合作，为配价论的发展、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改革做出贡献。

本文简要介绍配价论的基本概念和我们对汉语动词的粗浅认识。期望引起汉语界的兴趣和指正。

1. 配价论的基本概念

1.1 价与动词配价

价本系化学术语，指某元素的原子与几个氢原子化合的能力。元素的这一特性称为该元素的原子价或化合价。语言学家把这一术语引进语言学研究，把某些词类支配他类词的能力（与他类词组合搭配的能力）称为该词的价或配价（德文术语为 Valenz）。

德语具有配价特性的词类是动词、部分名词和部分形容词。动词配价也称动词价，指动词支配他类词的能力。当某个动词出现时，要求在其周围出现一定数量和一定种类的他类词。换言之，动词在其周围辟有一定数量的空位，必须用一定的成分填补这些空位，才能构成合乎语法结构的句子。动词的这种特性称为动词价或动词的配价。

1.2 补足语与说明语

1.2.1 动词价支配的成分组成句子的基本结构，是句子的结构成分，叫作动词补足语。

动词按其补足语的数量分类。不支配补足语的为零价动词，支配一个补足语的为一价动词，其他以此类推。德语动词按其价数分为五类，即零价、一价、二价、三价和四价。

补足语不限于名词和名词词组。凡是动词要求的成分都属于补足语。国内研究动词价的学者，不了解配价论七十年代以后的发展情况，囿于泰尼耶尔五十年代的认识水平，把动词价支配的局限于名词性成分或主语与宾语范围内⁽⁸⁾。

1.2.2 说明语指句中那些不受动词价支配、可以任意增删而不影响句子结构的成分。

例如：今天上午我去图书馆。

句中除了动词“去”共有三个成分。其中“我”与“图书馆”都不可缺少，是动词“去”支配的补足语。“今天上午”这一成分若删去，不破坏句子的结构，说明它不是句子的结构成分。由于说明语不影响句子的结构，配价论很少涉及说明语，但这绝不意味着说明语在句法研究中无足轻重。

1.3 必有补足语与可有补足语⁽⁹⁾

补足语分为必有与可有两种，它们都是动词价支配的成分。必有补足语是句子结构不可缺少的成分；可有补足语可以不出现，而不影响句子的结构。例如：

他送我一本画册。

句中“他”与“一本画册”都不可缺少，否则成为病句。但是“我”虽是补足语，却可省去。

必须明确可有补足语与说明语的区别。前者是某个动词价支配的成分，后者则完全不受动词价的支配。前者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删去，后者则可任意删减。

有人把动词价支配的成分称为“必有成分”，把非动词价支配的成分称作“可有成分”。做此种分类的同志不区分“必有补足语”与“可有补足语”。如果承认这一区分是必要的，就需采用合适的术语，不能都用“必有”与“可有”两个概念。我们建议在配价研究中使用国际通用的术语及其表达的内涵。即：

必有补足语
补足语(结构成分) <
可有补足语

说明语(非结构成分)

1.4 必要成分与可删成分①

这是语用范畴中的一对概念,指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为达到交际目的必须说出的成分和不影响交际进行,可以删去的成分。如:

你今天晚上做什么? ————看电影。

你什么时候有空? ————晚上。

在第一个答话中删去了“我今天晚上”,在第二个答话删去了“我…有空。”这些成分不影响交际的进行,可以删去。“看电影”与“晚上”是为达到交际目的不可缺少的、必要的成分。

研究句子结构,必须严格区分“必有——可有”与“必要——可删”这两对概念。前者属语法范畴,后者属语用范畴。语法结构上的必有成分不等于交际中的必要成分。反之,也不可把交际中的必要成分混同为结构上的必有成分。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可有成分与可删成分。

1.5 确定动词价的方法——删除法②

民主德国语法学家赫尔比希提出的删除法被认为是确定动词价的有效方法。其作法是:依次删去句中的一个成分,若句子结构不受影响,被删者即不是动词价支配之成分(说明语);若删去某一成分后句子结构受到破坏,此成分则为动词价支配之成分(补足语)。如:

我 一九四五年 出生 于北京。
— ————
* … 一九四五年 出生 于北京。
— ————
我 …………… 出生 于北京。
— ————
我 一九四五年 出生 ……………。
— ————
* 我 …………… 出生 ……………。
— ————

上述试验表明:

- a. “我”不能删去,是补足语。
- b. “一九四五年”与“于北京”这两个成分必须保留一个。若都删去,句子不能成立。这就是说,动词“出生”支配两个成分。其一为主语,其二为表示时间、地点的词语。“出生”是一个二价动词。

使用删除法时,还要注意动词的语义是否因删掉某一成分而改变。删去某成分后语义若发生变化,被删成分仍然是补足语。如:

他 送 我 一本书。

— — — ———
他 送 我 ……………。

删去“一本书”之后剩下“他送我”,这虽然是一个结构正确的句子,但动词“送”与原句中意义不同。这两个“送”不是同一动词。“一本书”不可删去,是补足语。

1.6 补足语的分类方法——代替法③

仅仅说明某个动词的价数,即支配几个补足语,还不能说明该动词的配价特点。

如:

- | | |
|---------------------|----------------------|
| ①他是 大学生。
— ———— | ⑤我们 为人民服务。
— ———— |
| ②他住 在这里。
— ———— | ⑥墙上挂着一幅油画。
— ———— |
| ③他看望一位朋友。
— ———— | ⑦我们走进教室。
— ———— |
| ④会议进行得顺利。
— ———— | ⑧院中出来一位长者。
— ———— |

上述各例中的动词都是二价。但它们的内容不同。就表现形式而言,有名词、副词。就句法作用而言,有主语,有宾语和补语。为了说明动词配价的特点,需要表明动词所支配的补足语是何种类型。

配价语法学界现在多采用德国学者恩格教授提出的代替法对补足语进行分类。其作法是:把某个补足语逐步简化成为代词、副词或其他形式,以此作为该补足

语的鉴别词。凡能用此鉴别词代替者，即为某种补足语。如：

昨天来过的那位先生又来了。

那位先生又来了。

他（或某人）又来了。

“昨天来过的那位先生”在句中作主语（配价语法称作主语补足语）。“他”或“某人”即为主语（补足语）的鉴别词。能用人称代词或“某人”代替的句子成分即为主语（补足语）。

他的住房申请书在你的办公桌上。

申请书 在 办公桌上。

某物 在 某处。

能用“某物”代替的句子成分也是主语（补足语）。“你的办公桌上”在此句中不可缺少，按配价语法此成分为情状补足语。凡能用“某处”代替的便是情状补足语。

我们用这种方法对汉语动词支配的补足语进行分类，得出九种补足语。这种方法能否用于汉语以及我们的分类是否妥当，尚待进一步研究。

2. 汉语补足语的种类

补足语是动词价支配的、构成句子基本结构的成分。句型就是由各种不同补足语组合搭配的类型。正确划分补足语的种类，是句型研究的根本。我们用“删除法”和“代替法”，对汉语的动词谓语句进行分析，得出如下九种补足语：

2.1 主语补足语

下列例句中划线部分是有关动词支配的主语补足语：

①他在北京上大学。

②这本字典是他的。

③骂人不解决问题。

④他晋升职称没有问题。

⑤墙上挂着一幅地图。

⑥这里住着一位王同志吗？

首先用删除法确定这些成分为补足语，然后用代替法判断鉴别它们的性质，即补足语的种类。上述补足语可用如下鉴别词代替：

某人、某物、某事

因此属于同一类型。我们称作主语补足语，简称主语。从语义角度分析，主语指一件行为的发出者，或指一个事件、一种状态、一个物件、一种存在等，相当于通常说的施事或系事。如果用上述鉴别词还难以判断时，可用：

某人做…、某人是…、某物是…

等形式分辨。

我们把所谓存现句中动词后面的名词及名词性词组视为主语，因为它们可以用我们列出的鉴别词代替。如例⑤例⑥，这两句中动词前面的成分不能用“某人”或“某物”代替，所以不是主语。按照我们的分类，它们（墙上、这里）是情状补足语（详见2、5一节）。

按照配价语法的原则，被动句应转换成主动句，然后再分析句中动词的配价特点。因为动词价是不变的，只是其支配的成分在被动句中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例如：

玻璃打破了。／玻璃被我们打破了。

敌人消灭了。／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打破”与“消灭”都属于二价动词：

我打破了玻璃。

我们消灭了敌人。

不能根据上述被动句认为“打破”与“消灭”是一价动词，也不能认为“玻璃”

与“敌人”是主语补足语。按照我们的分类，它们是宾语补足语（详见2.2.1节）。动词价及补足语的种类是依据主动句的结构确定的。句型也是依据主动句的结构特点分类的。在我们的分类中没有受事主语，也无施事宾语。

2.2. 宾语补足语

下列例句中划线部分是有关动词的宾语补足语，简称宾语：

- (1) 我认识他。
- (2) 我读过这本书。
- (3) 我做一件上衣。
- (4) 我很少写毛笔。
- (5) 我得请示上级。
- (6) 谁他都不认识谁。
- (7) 这种事我得请示。

判断宾语补足语的鉴别词是：某人，某物，某事等，这些鉴别词与主语鉴别词形式相同。遇到困难时可用：

涉及某人、涉及某物、涉及某事

等形式确定宾语补足语。

从语义角度分析，宾语补足语相当于行为的对象（例(1)(2)）、行为的结果（例(3)）、进行某一行为的工具（例(4)）以及行为的目的（例(7)）。

现在通行的语法著作把下列例句中划线部分视为宾语：

- (8) 桌上放着一本书。
- (9) 门口站着一个人。
- (10) 我去上海。
- (11) 我睡地板。

依据代替法的原则，用宾语鉴别词识别，它们都不是宾语补足语。例(8)的“一本书”与例(9)的“一个人”可用“某物”或“某人”代替，是主语补足语。例(10)的“上海”表示去的方向，例(11)的“地板”表示地点，分属趋向补足语与情状补足语（详见2.5与2.6）。

某些动词可以支配两个宾语补足语。如：

- (12) 他教我们英语。
- (13) 奖金的事我得请示上级。

但下面例句中的划线部分不是宾语补足语：

- (14) 他递给我一支烟。
- (15) 我们叫他师傅。

它们分属间接宾语补足语（详见2.3）与名词补足语（详见2.7）。

现行语法以位置作为划分主语与宾语的标准，配价句法则以鉴别词识别。这种方法（代替法）容易为外国人、尤其便于欧美人所接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妨一试，以开辟外汉语语法教学的新途径。

2.3. 间接宾语补足语

下列例句中的划线部分为间接宾语补足语，简称间接宾语：

- (1) 他送我一本书。
- (2) 他还了我10块钱。

这些补足语常常由表示“给予”的动词支配。即使省去，亦不影响句子结构，是可有补足语。他们的鉴别词是：给某人。

此类补足语也可与宾语补足语合为一类，通称宾语，因为它们都能用“某人”及“涉及某人”代替。现行语法也称此类动词为双宾动词。我们所以单列间接宾语一类，是为了与德语的第三格补足语对应比较，便于德国人学习汉语，也便于中国人学习德语。在语言对比研究中，应尽可能找出两种语言的共同之处。

2.4 介词结构补足语

下列句中划线部分为介词结构补足语，简称介词补足语：

- (1) 我们要为集体着想。
- (2) 我们虚心向先进学习。
- (3) 他给我们作了一个报告。
- (4) 我下星期把书带给你。

(5) 他对你很有意见。

这类补足语由介词结构构成，其鉴别词是：介词+某人、介词+某物。

如：为某人、为某事、对某人、对某事等。

有些研究动调价的同志，不把此类补足语视为动调价支配的成分。如吴为章的《单向动词及其句型》一文把下列句中的动词归入单向（即一价）：

人人以向秀丽精神自勉。

我跟他抬杠。

他与吴仲义相处十来年。

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

句中划线部分显然属于动调价支配的成分，因为删去它们句子即不能成立。

下列句中划线部分之前都可加上一个介词，口头表达中这种现象较多，尤其当这种成分在句首时：

那个家伙我越想越发疑。 = 对那个家伙……

这件事情，我自己认倒霉吧！ = 关于这件事情……

千担河水，我也洗不清自己。 = 用千担河水……

我们把这些可以加上介词的成分归入介词补足语。

2.5. 情状补足语

此类补足语范围较广，例如：

(1) 他住在上海。

(2) 书在桌子上。

(3) 他生于1960年。

(4) 会议开了一整天。

(5) 他跑了1000米。

(6) 他身高只有一米五八。

鉴别词是：在某地、在某时、这么久、这么多。

从语义角度分析，此类补足语表示地点（例(1)(2)）、时点（例(3)）、时段（例(4)）

、数量（例(5)(6)）等等。现行语法把这些成分归入宾语或补语。吴为章在关于动调价的文章中都不把补语看作动调价支配的成分。如下列例句中的动词都被列为单向（即一价）。划线部分未列入向：

(7) 他生在北京。

(8) 我长在武汉。

(9) 穷人的孩子整天蠕动在垃圾堆上。

(10) 我们相处十多年。

(11) 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

上述句中的划线部分用删除法试验，证明是动调价支配的成分，即补足语。它们都能用我们列出的鉴别词代替，所以是情状补足语。

情状补足语，特别是表示地点和时间的那一部分，常常以介词结构形式出现。它们与介词补足语的区别是鉴别词不同。情状补足语用“在某地”或“在某时”代替：

他生于北京。 = 他生在某地。

他生于1960年。 = 他生在某时。

介词补足语则要用“介词”+某人/某物”代替：

我们为集体着想。 = 我们为某人着想。

我明天把书带来。 = 我明天把某物带来。

下面例句中的句首部分都可以加上介词，成为介词结构，属于情状补足语：

(在)墙上挂着一幅画。 (在)北耳房住着摆匠刘师傅夫妇。

2.6. 趋向补足语

下列例句中的划线部分是趋向补足语：

(1) 我明天去上海。

(2) 我经过南京。

(3) 他向学校跑去。

(4) 我们从天津出发。

(5) 宿舍里搬进来两个同学。

(6) 柳树后出来一个黑影。

此类补足语表示从何处来、经过何地及到何处去。鉴别词是

从某地、经某地、到某地

表现形式有三种：a、以名词形式出现，直接跟在动词后面（例(1)(2)）；b、介词结构（例(3)(4)）；c、可加介词的方位词组（例(5)(6)）。这种情况多位于句首。

现在通行的语法把例(1)的“上海”及例(2)的“南京”视为宾语。我们用代语法鉴别，只能用“去某地”及“经某地”代替，而不能用“某物”代替，所以归入趋向补足语。

2.7. 名词补足语

例句中的划线部分是名词补足语：

(1)他是老师。

(2)他叫王大山。

(3)你是什么意见？

(4)我们叫他老洪。

(5)一个工是一块五。

此类补足语总在动词之后，表示与主语相等的事物，或表示判断，或表示隶属。

现行语法称作宾语，但这些成分不能用“宾语”的鉴别词“某人”代替，不能说：

“我们叫某人某人”。只能说：“我们叫某人这个”。“这个”和“什么”是名

词补足语的鉴别词。

2.8. 形容词补足语

以下例句中的划线部分称作形容词补足语：

(1)这皮包是人造革的。

(2)这些事是真的。

(3)这表是自动的。

(4)我觉得不舒服。

(5)他棋下得好。

(6)这辆自行车骑起来真轻。

(7)他把衣服做小了。

此类补足语可用以下鉴别词代替：

这样、怎样

现行语法把这些成分视为宾语（①-②）或补语（④-⑦）。按照我们的分类原则（用鉴别词分辨）应归入形容词补足语。从语义角度分析，此类补足语表达多种内容，如说明主语的特性，表明行为的结果或程度等。

2.9. 动词补足语

此类补足语指以下类型的句子成分：

(1)他叫儿子洗碗。

(2)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

(3)他帮助我学习。

(4)我看见他来。

(5)高大娘笑得肚子痛。

(6)他吓得浑身发抖。

此类补足语的特点是以动词结构形式出现；或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如例③④，或是动宾结构如例①②，或是主谓结构如例⑤⑥。它们往往出现在指令动词、表示结果的得字及兼语之后。鉴别词是：

要某人做某事，见（听）某人做某事，使得某人（某物）怎么样。

3. 句型划分的原则与方法

我们的研究限于动词谓语句的句型划分。形容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及省略句均不在本文讨论之列。配价论以动词作为分析句子结构的出发点。所谓句型，指的是句子的语法结构类型，而不以句子的表达功能或表达的意义特点分类。语法结构指句子结构成分（即动词价支配的补足语）的数量和种类，也就是补足语搭配组合的类型，或者说动词的配价类型。配价论认为句子由三部分组成：

a. 动词部分，这是句子的结构核心。动词价决定句中补足语的数量和种类。

b. 结构成分，即补足语。动词支配的补足语在数量与种类方面可分成不同类型，

这就构成了结构上各具特征的句型。

- c. 非结构成分, 即说明语。这不是动词价支配的成分, 其增删不影响句子的语法结构。在研究句型划分时, 可以不予考虑。

我们首先讨论动词部分, 然后分析补足语的数量和种类是怎样构成不同句型的。

3.1. 动词部分

动词部分包括以下成分:

- a. 中心动词, 或称主动词。是配价载体, 其配价决定句中补足语的数量和种类。

作结果补语的动词视为中心动词的组成部分, 如:

医生们一定会教活他。

我听惯了他的话。

这本我没买到。

有些动宾结构结合得很紧, 无论是结构上还是语义上都是一个整体。我们把它们视为一个动词。如: 打架、报仇、钻空子、碰钉子、退席、犯法、辞职、告密”等等。

- b. 助动词, 包括能愿动词及其他助动词。不是配价载体, 其增删不影响补足语的数量和种类。助动词总要求另一中心动词同时出现。例如:

我很想认识她。

“想”是助动词, “认识”是中心动词。句中两个补足语“我”和“她”是由中心动词的价支配的。删去助动词后, 补足语不变, 即句子的结构类型不变:

我认识她。

- c. 助词, 包括:

动态助词(了、着、过、来着)。如:

新年要到了。

我来了一年了。

他静静地听着, 一声也不响。

东屋的灯亮着。

这本书我看过。

我刚才打电话来着。

语气助词(吗、吧、么、呢等, 例句从略)。

结构助词“得”。

他的话你听得懂吗?

这个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 d. 作趋向补足语的动词, 如“来、去、上、下、进、出、过、起、开”等。

我明白过来了。

他昏过去了。

他迎上去。

3.2. 动词的配价类型

3.2.1. 动词可按其支配补足语的数量分成五类, 即

- a. 零价动词

指不支配任何补足语, 只用本身即可成句的动词。如: 上课了, 开学了, 下雨了, 刮风了等。

- b. 一价动词

指只支配一个补足语的动词。如:

她大声咳嗽起来。

宋明自杀了。

有些人掉了队。

- c. 二价动词

指支配两个补足语的动词。如:

他生在北京。

我跟他拍杠。

我们走进一座柏树林。

他们彼此兄弟相称。

研究动词价的学者对受动词价支配的成分看法不一致。吴为章认为上述例句全属单向动词(即一价)。

(2) 主语 + 介词补足语

我们要为大家着想。

(3) 主语 + 情状补足语

俺早就想睡睡甲板了。

其实里面藏着两个人哩。(赵树理)

(4) 主语 + 趋向补足语

两个人到操场去了。

他向院门处退着。(冯德英)

(5) 主语 + 名词补足语

通县过去叫通州。

(6) 主语 + 形容词补足语

你变得大多了。

娃娃吃得又白又胖。

这辆车是坏的。

(7) 主语 + 动词补足语

高大娘高兴得笑了。

3.2.2.4 三价动词句型

三价动词支配的三个补足语组合搭配的可能更大, 句型也更多。

(1) 主语 + 宾语 + 宾语

我问他一件事。

(2) 主语 + 宾语 + 间接宾语

他给过我钱。

这话谁告诉你的?

(3) 主语 + 宾语 + 介词补足语

他把衣服烧了个窟窿。

我向上级请示开会的事。

(4) 主语 + 宾语 + 趋向补足语

我还放到桌上一个。

(5) 主语 + 宾语 + 名词补足语

我们叫他老王。

(6) 主语 + 宾语 + 形容词补足语

蚊子跳蚤都不叮我, 嫌我的肉苦。

这种生活我过得够了。

我(做)饭做少了。

(7) 主语 + 宾语 + 动词补足语

她说服丈夫到公安局自首投案。

他想唤醒母亲上床睡觉。

(8) 主语 + 间接宾语 + 动词补足语

那个人民军战士指给武震看他们的城市。

(9) 主语 + 介词补足语 + 介词补足语

我把情况都对他讲了。

一个党员什么事情都得先从工作考虑。

(10) 主语 + 介词补足语 + 情状补足语

同志们把我留在营部。

(11) 主语 + 介词补足语 + 趋向补足语

他们终于把车子拉出了泥洼。

她把菜倒在花瓷盘子里。

(12) 主语 + 介词补足语 + 名词补足语

人们管这一行的人叫作“窝脖儿的”。(老舍)

(13) 主语 + 介词补足语 + 形容词补足语

这些书中就这种售得快。

她把眼睛哭红了。

他把这事办砸了。

④ 主语 + 趋向补足语 + 趋向补足语

打葡萄架上掉她脖子里头一个蝎子。(张寿臣)

3.2.2.5 四价动词句型

四价动词不多,所支配的补足语组合搭配的可能也很有限。据观察,有以下类型:

(1) 主语 + 宾语 + 介词补足语 + 介词补足语

我用一百块钱从他那儿买了这辆车。

(2) 主语 + 介词补足语 + 介词补足语 + 趋向补足语

他把工资给我送到家了。

桥隆彪双手把他按在凳子上。

3.3. 如何确定句型的层次

在3.2.2.1一节中列举的句型当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单子,肯定还应有更多的句型种类,只是我们未能归纳整理出来。上一节的目的仅仅在于用具体例子说明配价论划分句型的原则和方法。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我们感到得出的句型似乎尚有所不足。例如在同一句型内部仍可能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差别,下面的句子同属“主语 + 情状补足语”句型:

(1) 我生在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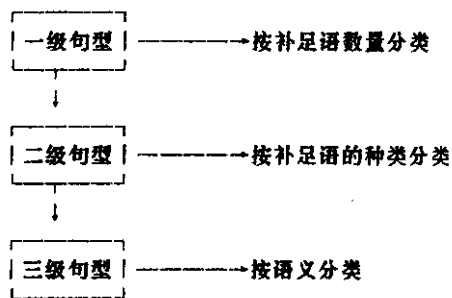
(2) 我生于1945年。

(3) 他跑了1000米。

(4) 他身高只有一米五八。

例(1)表示处所,例(2)表示时间,而例(3)(4)表示的则是数量。可见这一句型又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小类。当然,这些区别更多的是在语义方面,而不在结构成分方面。为了更全面地说明句型特点,我们认为有必要分出第三级句型,即在结构句型的基础上划分语义句型。

国内许多句型研究者采用结构与语义多标准分类法。如李临定先生在“现代汉语句型”中就列举了“存在句型、隐现句型、非意志句型、身体行为句型”等语义句型,同时又分出“无名施句型、无名受句型、双名受句型”等结构句型。李临定先生对汉语句型的描写有许多独到之处。但是把结构句型与语义句型并列似乎不妥,因为它们不属于同一层级。我们建议,在按结构划分出句型之后,再从语义角度细加分类描写,这样就形成一个科学的、分级的既反映句子基本结构特征又反映语义特征的句型系统。这一层级系统可用图形表示如下:



这种分类的好处是避免句型重复和交叉。下一级句型都具有上一级句型结构共同点,但相互之间又各具不同特征。

4. 结束语

句型应当反映句子结构方面的特点,研究句子结构的最佳方法是以动词为出发点。句型与动词愈来愈成为句法研究的中心。这些原则,即使在非配价论学者中,也已得到普遍的支持和重视。1985年11月在厦门召开的“句型与动词学术讨论会”就是最好的证明。吕淑湘先生在大会开幕词①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动词是句子的中心、核心、重心,别的成分都跟它挂钩,被它吸住。”这句话极精辟地说明了动词在句子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李临定先生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详述了建立句型系统是为了“充分地提供句子构造的基础规律。…划分句型的标准

只能是着眼于句子构造的特征方面。”⁽⁴⁾李行健先生完全支持这一论点，并进一步阐述说：“完全从句子表达功能或表达的意义特点方面去分类就是不行的。‘疑问句、陈述句、感叹句、祈使句’等类别的划分就不是从结构角度着眼的句型分类”⁽⁵⁾。但是，以什么理论和用什么方法去研究汉语动词的特点及句子构造的基础规律，似乎讨论不多。配价论也有人提及，但学者们还有很多分歧，评价褒贬不一。

配价论产生于法国，但发展于德国。可能由于语言障碍，我国语言学者难以直接阅读德文写就的配价论著作。本文用了较多篇幅介绍配价论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以引起汉语工作者对此理论的兴趣，并澄清某些已经过时的论断。我们对汉语动词配价和句型的认识是极其粗浅的，照搬外国研究模式的痕迹也十分明显。我们绝不敢妄想一举解汉语句型分类这一课题，只不过介绍一种研究方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而已。

注释：

- (1) 吕西安·泰尼耶尔 (Lucien Tesnière) 的代表著作是 1959 年出版的《结构句法基础》(Elements de syntaxe structurale)。书中提出了配价论的初步理论基础。
- (2) 对配价论作出重要发展的代表人物有联邦德国的乌利希·恩格 (Ulrich Engel) 和民主德国的格哈尔德·赫尔比希 (Gerhard Helbig)。他们的代表性著作见参考文献所列。
- (3) 用配价论进行语言对比研究并与德国学者合作工作的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意大利、西班牙及中国的德语学者。已完成的科研项目有《德塞对比语法》(Kontrastive Grammatik Deutsch-Serbokroatisch) 和《德罗配价词典》(Valenzlexikon deutsch-rumänisch)。

- (4) 见朱德熙《的字结构和判断句》、吴为章《单向动词及其句型》和《X 得及其句型—兼谈动词的向》。
- (5) 见西柏林大学郑英《德汉运动动词—语义与配价对比》(Deutsche und chinesische Bewegungsverben, ein sprachdidaktischer Vergleich ihrer Semantik und Valenz)。
- (6) 见韩万衡、舒马赫联合发表的报告《德汉动词配价对比词典的初步方案》(Zur Konzeption eines kontrastiven Valenzlexikons deutscher und chinesischer Verben)。报告收录在《汉德语言对比研讨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中。
- (7) 这些概念和分类见恩格的《德语语法》(Deutsche Grammatik)。
- (8) 见吴为章《X 得及其句型—兼谈动词的向》一文。
- (9) 必有补足语与可有补足语，这对概念由赫尔比希与申克尔提出，见其所著《德语动词配价与分布词典》(Wörterbuch zur Valenz und Distribution deutscher Verben)。
- (10) 关于必要成分与可删除成分的解释见恩格《当代德语法》(Syntax der deutschen Gegenwartssprache)。
- (11) 删除法是赫尔比希与申克尔在《德语动词配价与分布词典》中提出的。
- (12) 代替法是恩格提出的，见《当代德语法》。
- (13) 见“句型和动词”第 1 页。
- (14) 见“划分句型的原则和标准”。
- (15) 见“动词和句型的研究献疑”。

参考文献：

- (1) 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 商务印书馆，北京 1986
- (2) 李临定：《划分句型的原则和标准》(收入：句型与动词，语文出版社，北京 1987)
- (3) 李行健：《动词和句型的研究献疑》(收入：句型与动词，语文出版社，北京 1987)
- (4) 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1983
- (5) 吴为章：《单向动词及其句型》(收入：语法研究和探索二，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1984)

- (6) 吴为章: 《X 得及其句型—兼谈动词的向》(收入: 语法研究和探索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1988)
- (7) Cheng Ying
Deutsche und chinesische Bewegungsverben, ein sprachdidaktischer Vergleich ihrer Semantik und Valenz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New York, 1983
- (8) Ulrich Engel
Syntax der deutschen Gegenwartssprache
Erich Schmidt Verlag, Berlin 1977
- (9) Ulrich Engel
Deutsche Grammatik
Julius Groos Verlag, Heidelberg 1988
- (10) Ulrich Engel/Helmut Schumacher
Kleines Valenzlexikon deutscher Verben
Gunter Narr Verlag, Tübingen 1978
- (11) Ulrich Engel/Emilia Savin
Valenzlexikon deutsch-rumänisch
Julius Groos Verlag, Heidelberg 1983

Zusammenfassung

Han Wanheng, Autor der vorliegenden Studie und Germanist an der Fremdsprachenhochschule Tianjin, arbeitet zusammen mit Helmut Schumacher vom Institut für Deutsche Sprache in Mannheim an einem kontrastiven Valenzlexikon deutscher und chinesischer Verben. Er untersuch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die Möglichkeiten, die seit den fünfziger Jahren für das Deutsche und andere westliche Sprachen entwickelte Valenztheorie mit ihren Prinzipien und Methoden auch in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anzuwenden. Der Verfasser klassifiziert und bespricht neun Kategorien von Ergänzungen, die von null- bis vierwertigen Verben regiert werden, sowie die entsprechenden Satztypen. Er gewinnt damit Ansätze für ein neuartiges Grammatikmodell des Chinesischen, dem in der Didaktik des Chinesischen als Fremdsprache besondere Bedeutung zukommen könnte.

Konzeptionelle Überlegungen zur Gestaltung eines Chinesisch-Grundkurses für deutsche Studierende

Klaus Kaden/Ulrich Kautz

In den vergangenen zwanzig Jahren ist eine Reihe von Lehrwerken für den Chinesisch-Anfängerunterricht vorgelegt worden, vor allem von chinesischer, aber auch von amerikanischer und sowjetischer Seite, die insgesamt den Schluß nahelegen, es sei nicht gerade eine Aufgabe höchster Priorität, ein weiteres derartiges Lehrbuch zu erarbeiten. Jedoch lehrt die praktische Erfahrung mit mehreren verschiedenen Lehrbüchern, daß ein Unterrichtsmaterial immer noch fehlt, das nicht nur dem neuesten Stand der Fremdsprachendidaktik entspricht, sondern auch auf die spezifischen Erfordernisse des Chinesischunterrichts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zugeschnitten ist. Aus diesem Grunde hat eine Projektgruppe der Abteilung Sprache und Kultur am Institut für Sinologie im Fachbereich Asienwissenschaften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die Ausarbeitung eines Chinesisch-Grundkurses für deutsche Studierende in Angriff genommen. Das Projekt wird, optimistisch gerechnet, mindestens drei Jahre in Anspruch nehmen. Daran beteiligt sind: S. Gasde, K. Kaden (Projektleiter), U. Kautz (stellv. Projektleiter), H. Salzmann und B. Steinberg. Eine Förderung aus Mitteln der Volkswagenstiftung im Rahmen eines umfassenderen gemeinsamen Projekts mit dem Ostasiatischen Seminar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ist beantragt.

Das Lehrbuch ist in erster Linie für Sinologie-Hauptfachstudenten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gedacht, die beginnen, die moderne chinesische Sprache zu erlernen. Bei einer intensivierten Chinesischausbildung im ersten Studienjahr, wie sie mit 16 bis 18 Wochenstunden im 1. und 2. Semester zur Zeit an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praktiziert wird, soll der Grundkurs zusammen mit dem ihm vorangehenden Einführungskurs (s. u.) den Inhalt des Lehrgebiets Moderne Chinesische Sprache in diesem einen Jahr im wesentlichen voll abdecken. Jedoch ist es natürlich auch möglich, bei nichtintensivierter Ausbildung (8 - 10 Semesterwochenstunden) den Stoff des Lehrbuchs auf zwei Studienjahre zu verteilen, und auch der Einsatz an nichtuniversitären Einrichtungen der Erwachsenenbildung ist denkbar. Dagegen ist das Lehrbuch weder für den Selbstunterricht noch für den Gebrauch an Schulen oder im Rahmen von kurzfristigen Sprachintensivkursen für Nicht-Sinologen gedacht.

Die Durcharbeitung des Grundkurses setzt die Absolvierung eines sechswöchigen Einführungskurses voraus. Dieser vermittelt neben einer allgemeinen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und in die Haupteigenschaften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vor allem die Grundtagen der chinesischen Phonetik und der Zeichenschrift. Der Grundkurs geht dann davon aus, daß die Studierenden das chinesische Laut-, Silben- und Ton-system (nicht die Intonation) sowie die Grapheme (Striche), den Aufbau der Zeichen und die Gesetze der Strichfolge beim Schreiben im wesentlichen beherrschen. Phonetische Übungen zur Festigung und vor allem zum Einführen in die Intonationsgesetzmäßigkeiten werden in den Grundkurs noch aufgenommen, Erläuterungen zur Strichfolge dagegen nur in besonderen Ausnahmefällen gegeben (im Verzeichnis der Schriftzeichen).

In seiner methodisch-inhaltlichen Anlage basiert der Grundkurs auf den "Prinzipien eines Modells für Lehrbücher und Unterrichtsmaterialien asiatischer und afrikanischer Sprachen", die von einer Arbeitsgruppe an der Sektion Asienwissenschaften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1974 veröffentlicht wurden. Dieses Modell